

郭老与古文字学

——深切怀念郭沫若同志

胡厚宣

1992年11月16日，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，杰出的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。我们《甲骨文合集》的主编、尊敬的郭沫若同志诞生100周年。为了缅怀他的光辉业绩，继承和发扬他的未竟之业，有关同志让我写篇文章，不由得引起我难忘的追思和深切的怀念！

回想我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30年升入史学系，当即阅读郭老刚刚出版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写成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一书，深受教益。后来傅斯年代理系主任，徐中舒、董作宾、唐兰、商承祚都在北大教课，燕京还有容庚，后来辅仁又有于省吾，一时古文字之学大倡，我又喜读郭老1931年在大东书局出版的《甲骨文字研究》和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》两部杰作。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先生对我特别照顾，可以不通过借书手续，直接到他那里去阅览郭老在日本出版刚刚寄来的《卜辞通纂》（1933），《古代铭刻汇考》（1933）和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（1932）及《金文丛考》（1932）等书。

1934年北大毕业，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，发掘殷墟，整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，又得读郭老在日本新出版的《殷契粹编》（1937）和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》及《考释》（1935）。郭老在古文字和古代史方面的卓越成就，使我们

极为钦服。

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抗战开始，我随机关从南京迁长沙，1938年又从长沙经衡阳、桂林、柳州、南宁、龙州绕道越南迁昆明，一路又读郭老的《归去来》（1937）和《沫若近著》（1937），在报上还发表他的《在轰炸中来去》，以及他著名的《归国杂吟》的诗篇，“又当投笔请缨时，别妇抛雏断藕丝”，他为了抗战救国，居然“别妇抛雏”，“此来拼得全家哭”，公而忘私的伟大精神，令人很是感动。

郭老回来，曾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，后来又任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。1940年，我离开史语所，来到成都齐鲁大学，编印《甲骨学商史论丛》，每写成一篇，都寄郭老请教，他总有信回我，甚为客气热情。

上海有个大收藏家刘体智，字晦之，室名善斋，藏有甲骨28292片，装100个楠木盒，拓有《书契丛编》18本，交金祖同去日本，请郭老考释。郭老选了1595片，编为《殷契粹编》一书，其中有一片“四方风名”刻辞，郭老以为靠不住，未收。我写了一篇《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》，以殷墟发掘127坑的甲骨为证，说明不伪，并与《尚书·尧典》及《山海经》可以互相参照结合，当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他，他回信非常谦虚，说“尊见当是”。

我从成都来重庆，到天官府街他家里第一次见面向他请教，想不到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学者，竟是那样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

郭老回国在重庆，1944年先写了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，登在《群众》九卷二十期，1945年又收入所著《十批判书》，而且把它作为该书的第一篇，这种勇于创新、不断修改的精神更是令人崇敬。

郭老在重庆出版的学术论集，除《十批判书》之外，还有《青铜时代》（1945），都是有关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重要著作，在学术界起了极大的影响。

抗战结束后,1947年,我从成都回到上海,在复旦大学任教,郭老也回到上海,住在四川北路底溧阳路,相距不远,我也常常前去拜访,郭老对我表示非常欢迎。

在上海,郭老1952年又出版了《奴隶制时代》一书,是继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之后,研究不断深入,论点不断成熟,更为杰出的一部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著作。

建国后,1956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,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,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、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、又是历史研究所的所长,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。

1958年7月,为执行中苏科学合作协定项目,我奉派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讲学,正好郭老带团去斯德哥尔摩参加“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”,经过莫斯科时,住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。我去看他,他为我介绍了团里的廖承志、包尔汉、张致祥、吴作人等同志,说,“这是我们科学院的甲骨文专家”,甲骨学大师这样介绍,使我非常惭愧。等开会回来,代表团在莫斯科作了几天的停留,苏中友协招待他们游览莫斯科一整天,邀我作陪,在郊区白桦树林里一道采蘑菇,我感到非常亲切。

1965年1月天津王襄去世,我应天津文史研究馆之请,去找郭老题写碑文,郭老毫不犹豫,提笔就写了“殷墟甲骨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”一纸,交我寄往天津,他和于立群同志,一直送我到外院的大门口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郭老已经八十高龄,1972年1月他还作了一篇《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》,登在《考古》1972年第2期,同年8月又收入所著《出土文物二三事》。在他写这篇文章以前,1971年2月4日曾写信给我,问及关于𠄎字的问题。文章写完,交给我看,我也提了一些补充的意见,等文章在《考古》1972年2期发表,他追记说“文章写好后,经过胡厚宣同志看过,他为我提供了‘卜用三骨’一些佐证和关于𠄎字的刻辞四

条”，并把我的原信摘录发表，他就是这样谦虚和客气。

1972年，他又写了《古代文字的辨证的发展》，先登在《考古》1972年第3期，又登在《考古学报》1972年第1期。1973年又收入改编本的《奴隶制时代》。这是他论述中国文字起源的文章。

郭老逝世后，1987年11月我应邀第二次访问日本，11月9日下午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演，主持人日本甲骨学会会长松丸道雄教授送我书物中有《郭鼎堂旧藏甲骨文字》一册，系郭老在日本时蒐集的甲骨91片，经缀合后得79片，除近代仿刻1片之外，实共78片，现藏日本三鹰市亚非图书馆，又称郭沫若文库，这本书乃是据实物墨拓的复印本，没有发表过，非常珍贵。

又有《凡将斋藏甲骨文字》一册，系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教授以自藏甲骨的拓本相赠，拓本119片，颇有精品，原骨现藏故宫博物院。拓本上尚有郭老当年编辑《卜辞通纂》时所选用的编号，乃亲笔所写。我睹物思人，想到他当年在日本坚苦卓绝，奋笔写作时的情景，不胜景仰佩服之至。

谈到《甲骨文合集》，1959年我们编辑《甲骨文合集》，组织了编辑委员会和编辑工作组，郭老任编委会的主任委员，我任编辑组组长，后来他任主编，我任总编辑。他虽然因为年老事冗，没有出席过编委会，也没有到过我们编辑组，但我经常向他请示，他还是对我们的工作作了无微不至的指导和关怀，他让我们“尽可能把材料搜集齐全，书后多增加一些附录”，又让我们“仔细考虑，到底有没有帝辛时代的卜辞”。

因为遇到“农村四清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下放干校”等等运动，《合集》工作，前前后后、作作停停，最后终于停了一个很长的时期。

就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期，大家下放“干校”还没有回来，我家的电话已经拆了，郭老三次打电话到学部找我，留守处的谢友兰同志告诉我，宣传队说，“路远不传”。后来郭老就派

人通过张一宾同志到我家来，要我一、趁着我还年富力强，箱底下有什么稿子，赶快加以整理送去出版。二、多培养几个接班人。当时我想郭老也还在受着“四人帮”的迫害，在困难中他还有心思想到我，使我非常感动。他家门口驻着解放军，我不便找到他家，我就写了一封很诚恳的感谢信给他，我说他嘱咐我的事，一定遵照办理，接班人的问题，我有几个研究生，还有下放的同志，也陆续回来了，《甲骨文合集》的工作，就要恢复，请他放心，并请他对自己多加保重。

1973年5月27日，郭老把我写给他的信，加上批语，送给当时的科教组刘西尧同志，批语说“刘西尧同志，此件请您一阅，我觉得把《合集》的工作抓起来有必要。因为他们回京已经进行工作了。出版工作，尚未落实，如认为有必要，请考虑。”刘西尧同志1973年5月31日批“出版问题，由人民出版社负责，还是中国科学院负责，请庆彤同志批。”吴庆彤同志批“建议由中华书局出版。”国务院办公厅值班室1973年6月21日批“送科教组刘西尧同志，此件出版口徐光霄同志已阅。”刘西尧同志1973年6月23日批“送郭老”。郭老1973年6月25日批“请胡绳同志参考办理。”这样，《甲骨文合集》就成了国家和我们历史所的重要任务了。

《甲骨文合集》工作继续进行之后，我向郭老汇报，他很高兴，回信说“甲骨文合集的工作，大有进展，颇为欣慰。”又说“工作既在进行，就积极推进，把稿子编好，是目前第一要紧事。”

1977年1月12日上午，我偕同《甲骨文合集》编辑组的应永深、王贵民、孟世凯、杨升南四位同志拜访郭老，向他汇报工作情况。我汇报了一、参加人员，二、编辑经过，三、蒐集整理，四、选用编排，五、有关附件，六、书本版式，七、彩色图版，八、释文来源表及选本问题。他表示满意，又笑着说，“这样一

部大书，恐怕连研究甲骨文的人，都买不起了。”我告诉他，“日本把您的《卜辞通纂》和《殷契粹编》重印了。”他说“他们寄了样书给我。”我说，“还有一家出版社，翻印了您的《殷契粹编》，取消了释文，只印图版，著者署名刘体智。”他说“《殷契粹编》一书，可惜没有收那片‘四方风’的刻辞。”几十年了，他还想到我那篇关于“四方风”的文章。我说您身体都很好，他说“目力差，看甲骨文很吃力了，”又说“打针药都打不进去了，”言之凄然。我们怕他累，要告辞，他紧抓住我的手不放，说“再坐一会儿，你难得来。”

书快编讫了，我写信请他写一前言，他回信说，“前言我不能写，因为我没有参加工作。”1977年6月我又写信，请他题写书名，王廷芳秘书1977年6月10日替他回信说，“您给郭老的信，他已看到了。今年春天，他害了一场大病，现在虽已基本上好了，但体力还很弱，因此手有些颤，字写不好，书名他建议用铅字，请您考虑。”最后我还是跑到他家，请他在病中勉强题写了书名。

1978年10月《甲骨文合集》第二册首先出版，想不到郭老还没看到出版的样书，就于1978年6月与世长辞了。郭老的逝世，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，这对我们国家，特别是对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来说，是一个重大的损失，对我们《甲骨文合集》来说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，其损失更是巨大。

现在可以告慰于郭老在天之灵的是《甲骨文合集》自1978年10月出版了第二册，到1983年6月出版第十二册，全书13册出齐，马上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表彰和奖励，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说“这部书是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，”“学术价值很高”。1987年10月获得了吴玉章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历史学特等奖。1992年3月又得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首届古籍整理

出版评奖委员会颁发的古籍整理图书特别奖。现在释文和来源表，正在付印，选本在编辑中，补编也在准备编辑。

最近我们正在酝酿，将《甲骨文合集》编辑组，改为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中心，将采用最新方法把甲骨学与殷商史的研究工作，进一步现代化，作出一些更为出色的成绩。

关于郭老在古代史和甲骨学上的贡献，我过去已经写过几篇文章，登在《考古学报》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及《光明日报》。现在纪念郭老诞辰100周年，回想几十年来对我的教导以及对于《合集》的领导和关怀，就更引起我们深深的想念。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；沿着郭老所走的道路，继承他的遗志，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精神，向甲骨学殷商史的新的现代化的研究方向奋勇前进。

1992.9.6

追记：《甲骨文合集》编辑组已于1992年11月成立为中国社科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。特此说明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